

从青铜器铭文、《诗经》及《尚书》看西周祖先祭祀的演变

□ [美]柯马丁(Martin Kern)

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研究系 美国 新泽西州

就历史记忆所及而言,中国古代宗教活动和政治文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敬畏往昔。到了商朝晚期——即有最早铭文证据的时代——祖先祭祀和卜筮是统治阶层最重要的宗教制度。早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王室甲骨文记录和相对少量的青铜器铭文已经表现出对古时王权、世系和王权继承等基础观念的宗谱系统进行保存、敬畏、效仿的意识。不仅如此,崇敬祖先的思想和行为从更早时期兴许已开始演变。如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所述,它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的丧葬行为。到商代晚期为止,宗谱中共记载了21代定期进行祭祀的祖先。

在随后的西周时期,对过往的深切怀念和以先王为行为楷模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资料也更加多样和丰富。这些资料主要包含两种形式的文本,一种是传世的,另一种是经考古重新发现的:传世的文本是一系列保存于《诗经》的仪式颂诗和一些收录于《尚书》的王室演说,还有一小部分王室演说收录于《逸周书》。此外,过去一个世纪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上千件青铜器,其中有许多刻有铭文,一般来说它们主要用于祖先祭祀。大部分铭文篇幅短小,然而有一批西周铭文提供了对过去的长篇记载,主要讲述祖先及其后代即青铜器器主的功绩。

从最早的注释开始,《诗经》的“颂”就被认为与周王室(据称为西周)的祖先祭祀有关。这些文本的核心部分是31篇《周颂》,传统观点认为是在西周早期的祭祀过程中唱诵的。此外,《大雅》《小雅》《商颂》《鲁颂》中的一些篇目尽管并不直接来源于祖先祭祀仪式,但仍然或多或少包含了相关的祭祀细节。这些诗化文本在所有后世关于西周祖先祭祀的知识中占有核心地位,体现在对颂诗的直接解释以及在西周王朝倾覆几百年后编纂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中的记述。这些经典文本一部分基于早期的诗歌,一部分所呈现的知识似乎仅仅反映西周之后祖先祭祀的发展状况。因此,就如

何恰当地解释和建构颂诗中关于祖先祭祀的记述来说,它们并非独立或可靠的材料。因此,在西周祖先祭祀问题上,对“三礼”最恰当的理解是视之为对《诗经》和《尚书》早期文本中关于祭祀记述的最早注解。“三礼”作为注解而言所反映的不仅是对古代的认知,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东周时期人们对西周早期作为古代中国宗教、社会秩序和文化成就源头的理想化、系统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毫无疑问是历时性的,它把对西周纯粹的历史认知和随后的宗教活动与文化发展融合到了一起。

不仅如此,这些王室颂诗和演说经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后几个世纪的多次修订,才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总体而言,演说的情况比颂诗更加棘手。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尽管《诗经》的出土手抄本中含有很高比例的基于文字形态的异文和读解上的差异,但其古体的措辞从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开始维持着大体的稳定,而《尚书》中的文本直到汉代都在不断地变动。然而,虽然存在着这些编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因素,传世《诗经》和《尚书》的早期文本层中的古典词汇、用词选择和思想总体上都与西周晚期(不包括早期)和春秋早期(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6年)的青铜器铭文证据相契合。

不同于《诗经》和《尚书》的传世文本,迄今大量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多以它们原本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金文引得》一书中列举了商朝晚期至西周5758条铭文,铸刻在共9916件青铜器上,这些青铜器绝大部分在周王室宫廷中铸造。自2001年《金文引得》一书出版以来又有大量新的进展,其中不乏令人瞩目的发现,今已加以收录。青铜器铭文未经后世编辑改动,它不仅提供了从语言、历史、思想等方面衡量《诗经》和《尚书》,并且推定其时代的最佳标准,更提供了关于西周祭礼最原始的同时史料。尽管这些青铜器铭文中关于具体仪式程序的信息不如颂诗和演说丰富(更无法与多年后的礼仪类

经典及其他文本相比),但它们还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借此了解宫廷礼仪的一些具体细节,也为我们展示了祭祀时所使用的礼器,也使我们可依据仪式和观念的重要历史发展,以年代将西周划分为早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957年)、中期(公元前956年—公元前858年)及晚期(公元前857年—公元前771年)。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西周宗教的某些核心宗旨。尽管在《金文引得》所列举的5758条清晰可辨的铭文后,考古记录又有了显著增长,而这些记录永远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西周时期所铸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的真实数量,但是这些已有的样本量已大到足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总体态势。

这种视角对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内容构成了挑战,也使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按年代分期并就历史角度而言更加明智的方式来审视西周275年内的政治与宗教的思想和活动。

虽然青铜器铭文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富于历史细节的西周宗教活动的图景,但避免把这些铭文当作原始的历史记载或档案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颂诗和演说一样,它们绝不只是简单地以不偏不倚的形式,记录包括礼仪活动在内的史实,而是为了适用于特定的仪式语境——首先是为了祖先祭祀——而创造的,兼有宗教和政治的性质。铭文被镌刻在“可能是它们的拥有者和掌管者见过的最精良、最昂贵、最凝聚劳动者心血,并且最美丽的手工艺品”之上。礼器上的铭文造型精美,修辞充满目的性,提供的信息也经过严格的筛选,并服务于它们的制造者和拥有者的政治和宗教利益。铭文与面向非特定读者群的历史记录的区别之一就是它们有强烈的倾向性,甚至本来就是为宣传而制造的。这些铭文的目标读者不是现在或将来某些无名公众,而是少部分直接或间接参与周王室氏族意识形态中的局内人。他们或是王室的嫡系,或是以王室旁系身份从中获取政治合法性的人。这些文本使用极富歌颂性的措辞,有必要的话,也不受那些与它们自身的信息相斥的史实的影响。通过这些文本,一个古代的社会群体创造了一个他们所共有的记忆叙述,且对他们共同的起源和身份表达了认同。

西周的祖先祭祀因而具备了广泛的宗教和社会功能:它为祖先的灵魂和后代的联系提供了场所,祖先从后代获得供品,同时赐福后代作为回报。后代不会与祖先分离,死去的人们也不会真正离去。一般认为灵魂存在于“上”或者“天”,每到祭祀的固定时间就会降临,重申他们作为王朝生命和权力根源的存在感。第二,祖先祭祀构成和巩固了生者的身份认同和意志;对周王而言,祖先祭祀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历史基础和政治合理性。第三,由于祖先祭

祀集合了多种形式,包括诗歌、音乐、舞蹈、香氛、演说、礼器和供品,这种“多媒体发生”表现出的是一种贵族阶层的文化生活。与祖先崇拜的思想相联系,它体现了——至少根据它的修辞可以看出——这些活动的不断重复及其模式的延续是由祖先建立并传承下来的。第四,通过控制文化和物质资源及逐渐设立花销规则,祖先祭祀成为最早体现、合法化及贯彻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载体。第五,祖先祭祀记录了某些神圣的地点和时间:当宗庙被视为是王朝世系的缩影时(同样地适用于君王和王朝政体),对日常和季节性祭祀的例常观测就可以将自然年以宗教的节律划分开来。第六,祖先祭祀并不只是面向过去,向遥远的祖先打开一条交流的渠道,而且它还是一种誓约,让祖先的灵魂能够在未来永存。这种思想通过“尸”这一角色得到视觉化的呈现,它是由家庭中的青年人所扮演的祖先灵魂的媒介,也通过绝大多数西周青铜铭文的程式化结束语“子子孙孙永宝用”表达出来。最后,祖先祭祀与其他仪式和社会政治活动直接相关,其中包括宴享和册命典礼。由于具有如上多重功能,祖先祭祀成为西周社会、宗教及政治活动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知的所有关于西周宗教的信息,只要能追溯到同时期的文献(相对于几个世纪后的“三礼”以及其他文本中的记载而言),都来自本身与祭祀直接相关的资源,即青铜铭文、《诗经》里的颂诗和《尚书》里的演说。实际上,整个西周时期所有的书面化记载中,中国的传统经典只选择保存很小一部分严格意义上关于礼仪的文本,也就是颂诗和演说。

不仅如此,西周的统治精英将珍贵而不易锈蚀的青铜材料的用途严格限制于能够在祖先祭祀仪式上演诵的文本,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文字书写对于仪式表现和宗教目的的重要性。尽管有间接证据显示在行政管理、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现实情境中都有文字记载的存在,但这类文字都没有通过青铜器铭文(凭借能够长久保存的载体)或是颂诗和演说(凭借传承)的形式保存下来。换句话说,若是没有祖先祭祀这种机制,没有任何一种早期文献能以原貌保存或流传。由此同样可见,出于展示文本目的的书写行为,主要是在贯穿整个西周的祖先祭祀活动中得以演变。为了能最大化利用最早的关于祖先祭祀的材料——同时严格区分其与后世更加系统和详尽的描述——它们应当被看作他们所讲述的仪式过程的文化产物。这个视角将会把上文所提到的倾向性暴露出来,同时也引导我们把这些铭文、颂诗和演说看作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来考量。(陈彦辉 赵雨柔译)

■ 《国际汉学》2019年第1期,约30000字